

张冠秀《第六号天鹅》：
一只天鹅如何才能搏击长空

□曹文轩

张冠秀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阅读推广人，对自然生态由衷地关心，是一个对文学、对教育、对生命保持梦想并执着追求的人。十年来，她在工作之余，抛开喧嚣与躁动，埋头凝心于文学创作。我一直关注她的创作以及她所策划的各种读书活动，比较了解她的文学成长过程。她在地理科学、文学、生态学、环保公益、心理健康、生物、历史、音乐、美术等多学科融合下创建了“绿色教育”理念，其中的“心灵环保”——从生态实践活动到用优质的儿童文学书籍来润泽孩子们的成长，历经城乡中小学生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了属于她的文学风格和育人方式。

《第六号天鹅》不是一个普通的成长故事，而是一部文学、科普、生态三合一的长篇动物小说。作品语言细腻，内涵丰富，其温婉诗意的叙事，或急或缓，舒弛有节，轻轻揉进读者内心。润物细无声的沁入式引导、悬念重重的情节设置、依依不舍的深情离别，以及绝美辽远的自然地理风光、跌宕起伏的心海波澜，将故事一波又一波推向顶峰。只要仔细阅读这部作品，就会发现小天鹅飞越的“欧洲—非洲—亚洲”之间的多个点都是无缝对接的。其叙述时而如悬崖瀑布，激流澎湃，落地有声；时而如涓涓细流，温软贴心，潺潺流淌于绵长的生命成长长河。这是张冠秀的文字驾驭功底和扎实的科普育人综合能力的体现。整个故事字里行间不仅展现出了感恩、善良、友谊、真诚、乐观等人性之美，也有宽严有度的家庭教育儿之策，还有百折不挠的生命教育之光，更有生态文明之花处处开放，会让大小读者不知不觉跟随流畅的文字感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生物多样性”“与星球和谐相处”等高层次的生态理念。《第六号天鹅》是一部令德育升华，有深刻内涵的作品。

我曾在很多种场合说过，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的精神内核，在于润泽孩子们的心灵，增强自信，提升道义感，鼓励他们有责任、有担当、有梦想、有追求、有大爱意识。《第六号天鹅》由一只小天鹅磕磕绊绊的成长故事，延展到了全球生态环境的大格局，对于少年儿童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引导作用，这也正是该作的大气精魂所在。

我们再来品读故事：一只超过孵化期17天才出生的瑞士小天鹅鲁兹，柔弱、胆小，在罗伊斯河畔跟老画家和中国小男孩的邂逅中，将深厚的友谊刻在了彼此的心坎上。老画家为了一幅付了钱而没能送出的画懊恼不已，从此，他的琴声不再悠扬，也不再接活。善良的鲁兹觉察到了这点，挺身而出，决定为救助过她的男孩远行。面对这个疯狂的想法，爸爸妈妈并没有一口拒绝，而是通过家庭会议投票表决的形式，支持了她的意愿。不过，前提是先让鲁兹学习独立寻找食物和飞翔，甚至带她去太阳城进行魔鬼般的训练。当然，从后文中可以得知，这都是天鹅爸爸的精心安排。不难看出，文中天鹅一家的做法跟我们人类的育儿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天下父母为

《第六号天鹅》，张冠秀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5年6月



了孩子的成长操碎了心，唯有尽力托举。

出发后的鲁兹本想轻松突破阿尔卑斯山脉，向着东方一直飞，这样就能按照老画家的地图指引到达地处亚洲的中国，不料却误飞进了非洲，不得不挑战酷热的撒哈拉沙漠。就在眼睛疼痛难忍、无法行走的时候，遇到了渴望朋友的沙漠小狐洛克，两者本来是死对头，但洛克听了天鹅不远万里送画的梦想之后，不惜挨刺，用仙人掌汁液帮她清洗眼睛，结果，干旱多年的友谊泉喷涌而出。而当妈妈大叫着：“快咬断她的脖子！快！下嘴呀！足够我们全家吃三天了！小傻瓜，别愣着！麻利些！”的时候，洛克却一口拒绝，引着鲁兹安全离开了沙漠。这样的情节设置，会让紧张的读者如释重负，暂做喘息，并由此感叹道义之力量、悲悯之情怀。

接下来，鲁兹继续飞行，以为看到白石石头带子就是到了中国，实际上落入了东非大裂谷，又有一番磨难在等待着鲁兹：非洲行军蚁、刚果狮、美洲狮、鳄鱼……袭击不断，鲁兹随时有可能葬身于此，但聪明的她绝不会放弃，因为使命在身，中国小男孩和瑞士老画家都不会自己的家乡等地呢！那么，她是怎样冲出去的？此处玄机重重，跌宕起伏，精彩纷呈，彰显出张冠秀编织故事的能力。故事情节在推进，情感、精神等交织在一起，犹如一股股清澈的溪流，使读者的内心自然地荡起纯美的涟漪。

■动态

专家研讨纪实文学《我的父亲拉齐尼》

为深入挖掘纪实文学《我的父亲拉齐尼》的社会价值与文学意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戍边卫国精神，6月22日，由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新疆文联、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主办，新疆作协、喀什地区文联承办的“致敬时代楷模·传承奉献精神——纪实文学《我的父亲拉齐尼》专题研讨会”在京举行。新疆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席选斌，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驻会副会长、秘书长楚三乐出席并致辞。新疆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一级巡视员汪泽主持会议。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聂震宁，

于中城、马光复、李东华、李利芳、徐妍、冯臻、徐刚、杨雅莲、李苑、张凡、吴玉霞、唐莉霞及该书作者赵青阳等参加研讨会。拉齐尼·巴依卡生前为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一名护边员。他的家庭三代戍边，将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撒满了整个帕米尔高原。2021年1月4日，他为解救落入冰窟的儿童，不幸英勇牺牲，年仅41岁。《我的父亲拉齐尼》以他为原型，以其女儿的视角，真实记录了一家三代70多年如一日戍边卫国的感人事迹，诠释了无私奉献与家国情怀。作品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深圳援疆重点扶持作品，先后入选

中宣部“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国家出版基金2023年主题出版项目。与会嘉宾认为，长篇纪实文学《我的父亲拉齐尼》以双重叙事的独特方式，塑造了血肉丰满、可亲可敬的英雄形象及其家庭群像，在帕米尔高原的雪山之巅完成了对英雄精神的现代诠释与当代表达，使“时代楷模”的动人事迹走向更广阔、更深入人心的人文世界。这样的文学作品对引导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康春华）

《月光妈妈》走进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

6月27日，作家袁敏携历时14年采写完成的纪实文学作品《月光妈妈》走进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孔子学府校区暑假班课堂，带来主题为“月光照万里”的图书分享会，与五十余名学生、教师、家长及侨界代表共同分享书中那些关于坚守与梦想的真实故事。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总校长陈绿亚、董事长麻卓民、副董事长麻蕊芬、荣誉校长马雪枫等董事会成员出席活动。

《月光妈妈》记录了以“月光妈妈”原型高颖为代表的一群教育工作者，深入祖

国边地，用16年的守望帮助无数贫困少年改变命运的动人历程。麻卓民在欢迎致辞中说：“月光不热烈，却温暖；不催眠，却能照亮山川河流。”月光妈妈原是藏族孩子对杭州帮扶者高颖的称呼，如今已成为一群投身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代表。袁敏老师正是用她十四年里七上高原的坚持与真情，将这一群体的精神写入了书中，也照亮了我们的内心。”

分享会现场，袁敏向大家讲述高原姐妹花德吉拉姆与卓玛拉姆如何用知识点亮人生的灯火，游牧少年更欠智华用

诗歌写下对远方的向往，断臂女孩许方燕如何用顽强意志改写命运的剧本……她也将“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念传递至海外华人社会。正如她所言：“愿祖国的月光，能照进天下每一个华人的心，照亮孩子们回家的路。”这些感人至深的故事，不仅震动了在场每位听众的心灵，也唤起了大家对教育公平与公益精神的深刻思考。

活动结束后，她向校区赠送了《月光妈妈》一书，希望这束来自祖国的“月光”能伴随孩子们在阅读中成长。

■阅读札记

以红星为信 做党的孩子

——重读抗战儿童小说《闪闪的红星》

□汪芦川

《闪闪的红星》是李心田写于60年代的小说，原名为《战斗的童年》。1972年，该作品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入选教育部红色经典阅读书目，成为革命传统教育范本，被译成英、法、德等10余种文字，1974年改编的同名电影引发全国“学潘冬子，做党的好孩子”风潮。作家李心田既是毕生从军的军旅作家，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的作品如《两个小八路》《船队按时到达》都讲述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儿童英雄故事。《闪闪的红星》以20世纪30年代江西柳溪村为背景，讲述了红军后代潘冬子从懵懂少年成长为解放军战士的艰辛历程。红军长征北上后，潘冬子的父亲潘行义随军转移，临行前留给他一颗红五星作为信念象征。历经母亲牺牲、流亡复仇、投奔革命等磨难，潘冬子在红星照耀下与父亲约定“解放全中国再相聚”，完成了从个人复仇到投身集体解放的信仰升华。这颗贯穿始终的红星，既是父辈精神的传承，也象征党的光辉指引，照亮了一个苏区少年在血火中蜕变为革命战士的史诗之路。

《闪闪的红星》的故事最初被李长田表述为“一个红军家庭的故事”。因此，作品不仅是革命战争小说，更是一部以家庭为核心的感人的革命回忆录。在战争中被冲散，战后又团聚的“家庭”是小说的叙事焦点。从这一角度看，《闪闪的红星》似乎具有通俗小说中“失散—重逢”这一悲情性、巧合性和传奇性的情节模式，而潘行义留给潘冬子的那颗红星可以视为“失散—重逢”故事套路中的关键“信物”：

“爹想了一下，从他的挎包上撕下一个红五星，递给了我，说：‘冬子，我再给你个红五星。’我接过红五星，问爹：‘给我这个做什么呀？’爹说：‘我这次出去时间很长，你要是想我了，你就看看这颗红五星，看见这颗红五星，就和看见我一样。’我把红五星紧紧地握在手里，又看看爹……”

与传统小说中象征着偶然性团圆的认亲玉佩等

信物相比，红星预示了革命洪流中信仰共同体重聚的必然性和历史性。作为“无血缘的信物”，红星将生物性父子关系升华为政治性父子契约，使离散的肉身家庭被纳入“革命大家庭”的永恒性之中。贯穿全文的“红星”既是父亲留下的“信物”和情感纽带，维系着革命传统的血脉传承；又是党组织赋予的启蒙符号，激励着潘冬子磨砺精神与肉体。因此，李长田虽然征用了“寻父”的苦难故事模式，却赋予小说革命理想主义的崇高色彩，这使得小说兼具可读性和可学性。“党的孩子”潘冬子既寻找随红军长征北上的生父潘行义，也寻找作为精神之父的中国共产党。在“寻父”的过程中，潘冬子逐渐领悟到，只有将个人的复仇与整个阶级的解放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真正的复仇与解放。因此，潘冬子和潘行义红星照耀下的新约定只是“寻父”的象征性结果，“寻父”的真正结果是让潘冬子完成了对个人意义和革命理想的确认，即完成了成长的过程。在此意义上，《闪闪的红星》又是一部出色的成长小说。

小说时间跨度从1934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约15年时间，潘冬子从七八岁的儿童成长为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而与西方传统成长小说不同，《闪闪的红星》呈现了一种独特的革命成长叙事。在歌德或狄更斯那里，主人公往往被爱情或财富诱惑，而冬子面临的考验是是否堕入“复仇本能”铸成的仇恨深渊。在从陈伯钧口中得知母亲牺牲的消息时，冬子作出了这样的反应：“‘给我妈报仇！’我向着修竹哥哭诉着，‘下山把胡汉三和白狗子全杀死！’”主人公的复仇本能既构成叙事的原始驱动力，又作为需要被超越的革命初级形态而存在，文本也因此成功构建出革命语境下“从自发到自觉”的独特成长范式。在超越复仇本能的过程中，以修竹哥为代表的党组织成员扮演了将私仇转化为公义的关键性升华角色。此外，《闪闪的红星》以第一人称的主观叙事模式写作，与全知视角的客观叙事相比，这种叙事模式情感真切自然，叙事焦点集中流畅。“一九三四年，我七岁。”小说开篇的这句话奠定了作品回忆性自叙传的主基调，因此“我”在小说中一直具有两重视点，一是保存革命战争原初的创伤性与真实性的儿童视点，二是回忆、重述童年的成人视点。儿童视角的感官真实与成人视角的政治诠释之间形成了微妙的互文关系。冬子作为叙述者不断用成熟话语注解童年经历的过程，也是其在回忆中重新识别出当年被崇高理想召唤瞬间的过程。因此，这两重视点的交织证明，“党的孩子”身份早已在血火中完成了自我淬炼。

（作者系浙江青年作家）

■插图欣赏



林绘 《闪闪的红星》插图，陈水远、蔡锡

儿童文学评论
第六〇〇期